

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统一书号：3171·285

定 价：0.17 元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写
复旦大学红宣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写
复旦大学 红宣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2.875 字数 60,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285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语录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士

(代序)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这本小册子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付印以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量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因此，当本书正式出版发行的时候，很有必要写篇代序，对邓小平这方面的罪行予以清算。

在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条件，是党内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肥沃土壤，也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老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邓小平本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毒菌，而且深深地根基于这个基础，靠着它过活。邓小平对资产阶级法权就象苍蝇叮臭肉一样，是死死盯住不放的。离开了它，他就不能生存，也无法使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扩大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自己及其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如同《红楼梦》里贾政之流把系在贾宝玉颈上的那块“通灵宝玉”当作命根子一样。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时间虽

短,但在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可说真是做到了“拚老命”,不遗余力。对现存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扩大它;对已经被取消了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恢复它;甚至自己这辈子躺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享乐还不过瘾,妄图把它世代代传下去,充分暴露了他一副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的狰狞嘴脸。

为了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散布了种种谬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居然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起我们来了。那么,很好,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是不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既然邓小平大谈“基础论”,我们就和他辩个明白。

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和条件。建国以来,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从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到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继续革命,大力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正是因为“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吗?我们手里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强大的物质力量,就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就可以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年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然而,公社的英烈们依靠第一个工人政权,在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有效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可见，我们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为资产阶级的彻底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

邓小平所讲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显然不是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力量。他指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这点，他在一九五八年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表演双簧时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家都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电视机，每人每年六十斤肉，每天半斤苹果，再加二两白干”。这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似乎又要“丰富”一些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我们现在没有他所要求的“物质基础”，就不能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首先要“把物质基础”搞上去。这样一来，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刮十二级经济台风”来搞生产，把生产提到纲的地位，压倒一切，以目代纲，以目乱纲，自然就有了理论根据；他以搞生产来压革命，破坏革命，也就名正言顺，岂不美哉！真可谓痴人作梦，越作越甜了。难怪他睁眼说瞎话，攻击现在工业农业“发展不快”，工厂“企业亏损”，农业“拖了工业后腿”，“科研没有上去”，“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了。原来他要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搞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不合他的口味。只有搞“三项指示为纲”，在阶级斗争

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烟幕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让资本主义来一个大发展，他才心满意足。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丰富，人民生活的集体上升，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而邓小平开列的这张假共产主义的“半斤苹果”加“二两白干”的清单，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按照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搞下去，大发横财、享尽荣华富贵的，只能是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岂止每家有一辆自行车而已，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高级小轿车不是就有一长串吗？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对不起，非但这个“机”那个“机”可望而不可及，而且肯定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一贫如洗。

“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邓小平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又捧出他的“功劳簿”来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虽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还不得不实行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制度，在政策上允许劳动收入的差别，八级工资，不管你家里人多人少，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这种现存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自觉地去限制它，不是扩大差别，而是要逐步地缩小差别，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叫嚷“多劳多得”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把它奉为神圣，捧成绝对合理的东西，这是直接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唱反调，其罪恶目的就

是要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保护党内资产阶级“大官”们的利益。不是吗？邓小平到处牢骚满腹地叫嚷什么：“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好一个“出力”外加“功劳”、“苦劳”、“疲劳”，在这里，邓小平这个政治掮客的投机商嘴脸不是自描自画得清清楚楚了吗？他把他们那一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扮成“功臣”，把投奔革命当作入股，把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搬入党的政治生活，“出力”就要拿钱，以“功劳”、“苦劳”、“疲劳”伸手向无产阶级索取“高报酬”。在邓小平看来，他们这伙修正主义的“大官们”，能力最强，贡献最大，“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他们压在天平的一端，必须投以重金，才能与他等价。这些人，“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他们要象资产阶级一样，“竭力把事情安排得能够使他们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邓小平口口声声地大讲这个“劳”，那个“劳”，无非就是让搞修正主义的“大官”向党和人民大“捞”一把，以便靠别人的血汗，“满意而舒服”地大享其乐。事实上，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无不是通过某些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吃剥削饭，当官老爷的。这是什么“多劳多得”！分明是用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法，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走资派的所有制。要说“功劳”与“苦劳”，邓小平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大官”们攫取更多的财富方面是确实有一番难言的“功劳”与“苦劳”的！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太死，限制死了要掉下来。”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简直是仇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他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地攻击我们限制得“太死”、“要掉下来”，真是气势汹汹，猖狂之极。

邓小平污蔑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太死了，就是指责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过份了。真是过份了吗？不！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来说，对于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从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决不是“太死”了、过头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广大革命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一定还会创造出许许多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来。毛主席说：“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我们能不去发扬先进的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扶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而听任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泛滥，让资产阶级法权万古长存吗？绝对不能！可爱的先生们，你们“太死”、过头之类的吓唬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批，就是要限制，就是要与你们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决不能让你们这些党内资产阶级躺在资产阶级法权上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实，所谓“太死”、“要掉下来”云云，只不过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反革命进军号而已。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触到了邓小平之流

的痛处。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大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和发展起来，这是革命人民拍手称快的大好事，而对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则是大难临头，犹如面临灭顶之灾，怎么得了？他预感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越壮大，他们的丧钟就敲得越响，所以，必欲置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于死地而后快。你看，邓小平一类污蔑老、中、青三结合是“三凑合”，竭力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是“雷同化的根源”；胡说赤脚医生水平低，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反对工农兵上大学，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叫嚷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等等。邓小平从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用刘少奇、林彪也包括他自己搞的修正主义那一套去衡量一切，对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怎么看都不顺眼。一句话，什么都“太死”了，非翻案不可，非算账不成，铁了一条心要扭回去，扭回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邓小平攻击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太死”，刻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天要“掉下来”，是由其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但历史是无情的。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的国家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真正要“掉下来”的只能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一些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政治

垃圾。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无产阶级的天是永远掉不下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的艳阳天在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将更加光辉灿烂。

“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邓小平妄图用超越革命阶段的谣言蛊惑人心，来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打下去。在这里，邓记谣言公司兼营起制帽业来了。然而，所谓“根本脱离实际”、超越革命阶段的帽子是戴不到革命人民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者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既要承认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任其发展和扩大。如果不对它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和扩大，就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助长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不但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且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战士。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责任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肩负着支持共产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任。如果说这就叫做“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那么，我们是搞定了。至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只有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才有可能。现在我们还不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为什么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一看到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跳出来诬蔑呢？说穿了，这不过是胡风们“以攻为守”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说人家刮“共产风”正是为了掩盖自己

刮“资产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谣言和诡辩无损于正义事业的一根毫毛。刘少奇、彭德怀之流不是曾经攻击人民公社“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妄图扼杀人民公社制度于襁褓之中吗？结果如何呢？人民公社的金桥架遍祖国大地，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喧嚣却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邓小平又在攻击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了，其结果难道不是与刘少奇、彭德怀一样吗？！

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追随刘少奇，一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重新工作之后又与无产阶级在限制与反限制问题上进行了一次严重较量。斗争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鉴别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凡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扯起修正主义杏黄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谁，他搞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向党内资产阶级演变；他顽固地坚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会变为走资派，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就是处于如此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在这点上，来不得半点含糊。

与邓小平的这一次较量还说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只要阶级、阶级斗争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的倒台，决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刘少奇倒台以后，林彪继承

了刘少奇的衣钵，大搞“官、禄、德”，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扼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林彪葬身沙丘之后，邓小平更是继承刘、林的失败事业，变本加厉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向我们敲了警钟；邓小平的倒台，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存在，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要充分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党内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反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说明他们有力量。恰巧相反，这说明他们日暮途穷，正在作垂死挣扎。新兴的无产阶级最有力量，前途无限光明灿烂。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产阶级要彻底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取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要加强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我们坚信，通过我们若干代无产者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法权将一定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与青铜器、手摇纺纱车陈列在一起。

目 录

- (一)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2)
- (二)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性……………(13)
 -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是不可避免的……………(13)
 -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17)
 - 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
还严重存在……………(23)
 - 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着统治地位……………(29)
- (三) 社会主义社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33)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
限制与反限制的经验教训……………(33)
 - 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建国后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53)
 - 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63)
- (四) 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72)
 - 认真看书学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72)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7)
 -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80)
 - 做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的模范……………(83)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犹如光芒万丈的灯塔，照遍祖国四面八方。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认真看书学习。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学习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批判《哥达纲领》时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正确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什么？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避免？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怎样广泛地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我们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和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的部分同志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学习讨论，下面是我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一)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仍实行商品制度，买和卖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无论在城市的大街上或在农村的集镇上，我们都可以碰到众多的买卖关系。当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大车满载着丰收的粮食和棉花向国家收购站奔驰，换取货币，然后再以货币换回农机、化肥、农药的时候，这里就完成了两次买卖活动。第一次是出售农产品，第二次是购买工业品。所有的买卖活动是依据什么原则进行的呢？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叫做等价交换，即一定量的劳动产品可以和等量劳动的别的产品相交换。这条原则就其性质来讲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还要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要了解这一点需要对它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亲身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容易懂得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东西。现在，许多工人都在读《资本论》，这是马克思为我们工人阶级写的书，是我们“自己理论的圣经”，^①每一句话都表达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声，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力变成了商品时，十分形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第236页。

象地描述了资本家以货币所有者的资格同工人以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格，在市场上相遇，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来到了静悄悄地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的情景：在那里，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①这种劳动力的卖买关系是最典型最完整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从所有制关系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厂房、机器、工具、原材料，等等；而我们工人却“自由得一无所有”，^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被迫只好拿自己所有的仅只存在于“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③资产阶级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形式上似乎对所有的私有财产一律加以保护。然而，工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私有财产。所以，形式上是承认一切人都有私有财产权，实际上只是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来看，表面上资本家是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所有者，工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大家以平等的所有者资格进行等价交换；实际上，这里不过是资本的王国，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④等价物与等价物交换的帷幕后面，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资本家是天堂，对工人是文明监狱。从分配关系来看，形式上资本家似乎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格，付给了工人工资，实际上工资经常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通过使用工人的劳动力，榨取了由工人创造的、大大超过工人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200页。

②③④ 同上书，第192页、191页、199页。

资的价值，即大量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劳而不获，被资本家榨干了每一滴血、耗尽了每一根筋骨和每一个肌腱。上述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形态。这是典型的货真价实的在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的不平等制度。这种在形式上似乎对人人都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最大的不平等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①关系。

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就完全取消了呢？没有，它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取消。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是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谬论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旧社会的痕迹表现在分配方面，就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当时设想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的条件下，每一个生产者参加社会劳动后，就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它不是货币，而是劳动者领取与自己劳动量相当的消费品的一个证件。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即扣去公积金、公益金等之后，生产者凭那张证书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后，又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全部领了回来。可见，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中间的分配，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既然，通行的是调节商品关系的等价交换原则，那么“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因为“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的，提供劳动越多权利就越大，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有的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比另一些人强些，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他们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样他们就分配得多一些。这种平等权利，对劳动能力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另外，有的人已经结婚，有的人则没有；有的人供养的老小较多，有的人则较少，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些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些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些人富些。所以，这种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就其内容来讲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很明显，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领域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按照商品交换中通行的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所形成的那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权利。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继承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并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内容。首先，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列宁当时设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将把所有生产资料变为整个社会的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即在所有制方面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第二，列宁指出，做到了这一点“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分配领域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一下子还消除不了的缺点。第三，列宁又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是新事物中的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既然资产阶级法权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就必然还要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来保护它。所谓“没有资产阶级”，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所谓“资产阶级国家”，也不是说它和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本质区别，而是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当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物质和精神条件都已具备，人们“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从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时，是以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归整个社会所有，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已经消亡为前提的。当时，也只能作这样的设想。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起《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情况来，范围要广一些。因为，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一下子把全部的生产资料收归全社会所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并且还会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与此相适应，商品和货币交换也不可能很快取消。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七年的斗争实践已看到了这一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列宁逝世以后五十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作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深刻地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①

① 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除了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外，还明确指出了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方面也“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既讲了经济基础的问题，又讲了上层建筑的问题，分析了资产阶级法权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再一次告诫全党警惕出修正主义。事实正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还会发展，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尚存在着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去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就不可能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和必须限制的经典论述，是我们研究、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讲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弊病”，列宁讲的“产品‘按劳动’分配”的“缺点”，毛主席讲的“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都是指这些领域通行的仍是资本主义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同一原则，还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在形式上平等的口号掩护下的实际上的不平等。革命导师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都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可见，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表现。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是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的产生、发展、部分取消、限制直至最后消失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表现,我们需要简单地谈谈商品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一样,商品生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但是,它比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格要老一些。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两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这样商品生产就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在整个古代社会里,奴隶主和封建地主主要是靠剥削奴隶和农民的剩余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商品生产没有成为支配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统治形式,只能在社会生活的隙缝里存在和发展。与奴隶制、封建制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公开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是不平等的社会,但那里是直接的毫不掩饰的不平等,阶级表现为等级。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搞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把社会划分为多级阶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辛勤劳动中积累了生产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扩大,这就使商品生产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且刺激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两极分化。少数条件好的商品生产者,赚了钱,富裕起来,使其有可能从劳动者中分离出来,成了不参加劳动的产品占有者,即成了工业资本家。而大多数生产条件差的生产者,赔了钱,陷于贫穷破产,成了除两手

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即成了雇佣工人。这样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在商品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情况不同，商品生产典型化、普遍化了。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类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① 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 它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宣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所谓百万富翁和身无分文的工人一样“平等”。实际上它是用饥饿代替了奴隶主和农奴手中的皮鞭，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即金钱的奴隶。在那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就看占有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多少。资本越多，地位就越高，可以坐到资本金字塔的顶端；一无所有，就只能当雇佣工人。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商品化了，到处是等价交换，到处是形式上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到处充斥着资产阶级法权。

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特点，它既表现在劳动力的买卖上，以等价交换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商品生产，各行各业都不可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有许多的资本家在同时进行生产。例如，同样生产一辆小汽车，假定张三的工厂花了九百小时，李四的工厂则花了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82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8页。

一千小时，王五的工厂却要花一千一百小时，在市场上到底按那一个作为价值标准呢？只能按社会上大多数工厂生产一辆小汽车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如果大多数工厂是花一千小时，那就按一千小时计算。张三的工厂实际只花九百小时，交换时可以按一千小时，于是就赚了钱。王五的工厂花了一千一百小时，交换时也只能算一千小时，于是就亏了本。而他们花的劳动时间多少，是由各自工厂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发展，竞争愈加剧，那些条件优越的商品生产者总是赚钱，那些条件差的商品生产者总是亏本，有的发财，有的破产，两极分化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里，等价交换的表面上平等同样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表现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也表现在资本家与资本家、资本家与独立小生产者之间，可以说是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只要商品经济关系还存在，作为它的表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可能完全取消。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还有私有制的残余，所以还要实行商品制度。至于分配领域，它实行的也只能是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同样与商品经济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既然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那末，它在性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与它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今天，在我们国家里，虽然还不得不承认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我们

决不能欣赏它、追求它，而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用无产阶级专政去限制它，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它，以至最终消灭它。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要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朝着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性

新旧社会两重天。

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和资本主义制度及一切剥削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劳动人民同声歌唱“社会主义好”。不过，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具有极大优越性的同时，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尖锐的斗争，看到它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还有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一面。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它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弊病。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是和它的固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特点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个剥削人的社会。这个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欺骗、暴虐和掠夺，充满了不平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是人类最高理想。它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一切剥削制度截然不同的社会。从前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变成后者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天真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好比要一个刚出娘胎的婴儿一瞬间就长成为一个壮年人一样不可思议。共产主义要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只有经过它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方能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这种旧社会的痕迹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法权将作为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分不开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情况。”^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已经代替了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不完善的方面，除了新制度本身需要一个完善过程之外，还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消极作用，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斗争之中。矛盾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各自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不断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过程。斗争的结果，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由小变大，在一切方面逐步上升为支配的东西，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则由不断地限制而缩小其范围，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在斗争中越战越强，资产阶级代表旧的生产关系进行垂死挣扎，不断受到沉重打击而削弱，直到最后被消灭。然而，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作为旧社会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痕迹的资产阶级的法权就不可能消失。

社会主义社会里,旧的社会分工还不能立即取消。虽然,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比起旧社会那种对立的状况应该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工业比农业先进;城市比农村现代化;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这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三大差别,这些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消灭三大差别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只要三大差别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也就必然存在。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的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应当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坚持两点论,反对形而上学,要看到既承认它、又限制它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一讲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就不对它加以限制,任其扩大,那是搞修正主义。而一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想一下子把它全部取消,当然也是不对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必须把重点放在限制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积极措施对它进行坚决的、恰如其分的限制,逐步缩小其活动范围,防止它的消极作用和破坏作用,为最终取消它努力创造条件;当然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交换和分配形式,是由现阶段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还要允许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些领域里存在,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

还没有达到“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了普遍的现象”^①的水平。因此，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来保生产资料公有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也就是还不得不允许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的某些领域继续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是这样。只有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才会取消。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然性，是要限制它、缩小它，直至最后消灭它，而不是扩大它，把它凝固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在那里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们的目的与我们根本不同，他们是要把资产阶级法权这种不平等奉为神圣，不断地强化它、扩大它，把它永远保存下去。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总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使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逐步地

^①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41页。

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到一九七三年，在工业方面，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包括了全部工业固定资产和工业总产值，职工人数占了工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其中全民所有制又占了很大的优势。在农业方面，集体所有制占了农业生产资料中的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生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集体所有制商业占零售商品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其中国营商业又占了绝对优势。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所有制方面占统治地位，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变更正是我们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出发点，离开了这一点就会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和旧制度的根本区别，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还只是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首先,我国还存在一小部分私有制的残余。在工业方面,还存在占工业人数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包括农村中少数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如木匠、竹匠、铁匠、泥水匠、成衣匠等。商业方面,还存在占全国商业零售总额百分之零点二的个体商贩,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还保留着少量的自留地和一些家庭副业,包括饲养家禽家畜,搞家庭手工业和从事采集、养蚕、养蜂、渔猎,等等。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旧中国小生产如同汪洋大海。今天广大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广大贫下中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在党的教育下,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还会受资本主义的侵蚀。至于一部分富裕农民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总想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进行投机活动,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正如贫下中农在批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时说得好:小生产旧习惯多保留一分,离社会主义就远一分;小生产思想多发展一步,离资本主义就近一步;沿着小生产道路走下去,就势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显而易见,私有制在我国所占的比重虽小,仅是一种残余,但如果不对农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弄得不好,势必削弱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导致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逐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对这一部分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页。

私有制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促进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还只是部分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拿生产队与外部的关系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公社以至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无权统一调配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及产品。也就是说，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仅仅是一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而不是整个社会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同时，由于各个劳动集体单位的设备能力、自然条件和技术程度有差异，体现在分配上必然也会有差异。以甲乙两个生产队为例：假定甲乙两个队耕地面积一样，人口一样，而甲队的土地比较肥沃，地理条件比较好，灌溉方便；乙队则相反，那么即使乙队和甲队花上同样的劳动力，到收割时甲队的产量要比乙队高，反映到每个社员的个人收入上，甲队每个社员的收入就比乙队每个社员的收入要多，客观上就有了差别，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至于两队种植的作物经济价值高低、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别等等因素也会造成收入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仍然是一种不平等，还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法权。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我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在更远的将来，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有一个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搞得不好,很可能演变为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会倒退到私有制的老路上去。

即使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还有个领导权问题。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①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他的实际内容。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权为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全民所有制也只能有名无实。即使是好人掌权,如果路线错了,那么,领导权的问题也不能算是解决了,还有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可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执行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决定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也决定了我们的工厂企业归哪个阶级所有。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认真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执行“鞍钢宪法”,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道路,大干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的消极作用就会受到限制,

^① 转引自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会得到逐步巩固和发展。与此相反，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了政治的领导权、生产的管理权、产品的支配权，必然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招牌下，大搞资本主义经营，把一部分企业改变成这些人的私有领地，重新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力，使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得以复辟。尽管有“国营”、“全民所有制”的招牌，而实质是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着资本主义的路子。正如工人所说：“方向路线偏，企业性质变。失去领导权，就会丢掉主人翁，变成雇佣工”。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存的情况，决定了我国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目前，我国还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商品交换关系：(1)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3)公社社员之间、农民同城镇居民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此外，职工同社会主义商业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以“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的。职工通过工资的形式从工厂企业领取了劳动报酬，然后到商业部门购买各自需要的消费品。这种交换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分配个人消费品的一种形式。这种交换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的原则，交换的结果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所以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虽然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调拨，交换的结果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仍是全民的财产，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毕竟不同于将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各个国营企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国营企业之间产品的调拨，仍需计价、付款，所以还保留了某种

商品的属性。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因为所有制变更了，它和资本主义有所不同。但是，就这种商品交换通行的原则来说，却同样是等价交换这条资产阶级法权原则。这点它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商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价值规律必然在商品交换中仍起着某些作用，供求关系在某些方面还要影响到价格，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利用商品差价和价格变动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有些人还可能利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将它转化为商业资本，来大发横财。还有的人可能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取得大量货币，开设“地下工厂”，将货币转化为工业资本。在货币消灭之前，“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①一旦货币转化为资本，必然又重新回到把劳动力也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旧制度上去。

综上所述，我国所有制方面要完全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还有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还要努力作战。

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

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的相互关系是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不过相互关系也具有很大的能动作用，它反作用于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还起着决定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处于资本家的统治和支配之下，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

^①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38页。

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①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而地主资产阶级则由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被迫接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在劳动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现阶段，在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及其所属的劳动知识分子是两个劳动阶级。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主要就是这四个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关系。这四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平列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必然要受到它的支配、制约或影响。修正主义者抹杀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阶级性质，侈谈人们相互之间是什么抽象的“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这是荒谬绝伦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绝对没有超阶级的“同志、朋友和兄弟”关系。要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统治去跟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完全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掩护他们向无产阶级搞反攻倒算，让他们再次爬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①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立以后，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大量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即两大劳动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为地主、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而是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而劳动。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了。马克思说：“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①这里是指整个生产资料已归全社会所有的条件说的，我们朝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已给发展新型的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同志式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我国劳动人民内部现在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不论是生产工人、人民公社社员还是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工作，彼此只有职务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如我们工人所说的：“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原则上是一种互助协作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它是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相互关系现在已经十分完善，已经不具有阶级性质了，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本质上仍是阶级关系。因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必然要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打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

上阶级的烙印。同时,旧的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陈腐习惯还对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因此,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除了前面我们所说的互助协作的基本一面之外,客观上还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还严重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首先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别,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

在旧社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是根本对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日益发展着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的新型关系。工农联盟正在逐步加强和巩固。但是,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工业和农业,还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低的差别,工业中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主,而农业中则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主。客观上,在生产技术、文化、生活等方面,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虽然已经逐步在缩小,但是并未完全消灭。这一切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城乡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如果这些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我们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缩小它,那么工农联盟就不可能是巩固的,将会妨碍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的差别,要注意在这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他们能够建立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同志式

关系。但是，由于旧的分工还没有完全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着差别。脑力劳动者持有一定的技术理论知识，一般说来，脑力劳动者在生产中是执行组织和管理职能，而体力劳动者主要是进行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在许多方面，脑力劳动者仍然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注意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技术至上”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会泛滥成灾，新的精神贵族就会一批一批地出现，又会重新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列宁曾经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①历史经验证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存在也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温床。所以，我们时刻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影响，必须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大力推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社会主义社会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劳动阶级内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体上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与被领导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上同志式的关系正在日益发展。在革命队伍内部人们在革命中、生产中、工作中的地位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普通一兵，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平等互助、同甘共苦。人们的工作虽然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然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应该有任何特权。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②但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三大差别存在，领导与被领导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3页。

^② 转引自196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的相互关系方面，必然存在等级差别和某些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瘟疫”，如等级观念、私有观念、名利思想等仍然经常腐蚀着人们灵魂。如果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就很容易会去扩大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例如，有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不同程度地滋长了脱离群众的官气，贪图个人享乐，欣赏和追求起资产阶级法权来。这种热衷于利用职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领导者，必然要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从而破坏领导和被领导的同志式关系。

总之，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三大差别，实行商品制度，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不断地巩固和完善，这和能否正确地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关键又在于路线是否正确，搞不搞马克思主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调整得好了，就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否则，人们的相互关系搞坏了，所有制会变，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会复辟。社会主义新型相互关系的逐步建立，是我们同旧传统、旧习惯斗争的结果，是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而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不同程度地严重存在，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资产阶级和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千方百计地强化、扩大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他们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即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起来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相互关系也不能自发形成，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影响，我们要自觉地去

不断加以调整。

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着统治地位

消费品分配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分配形式,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任意选择的,而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一定的分配关系一旦确定,又反作用于所有制。

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由于所有制变更了,生产资料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手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第一次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对资本主义那种“按资分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分配形式的一个否定。这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要求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而社会则按每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消费品。在我国现阶段,以工资形式和工分形式付给职工和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报酬,都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还有其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还要运用这种分配形式,还要承认人们在劳动收入上的差别。但是,按劳分配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形式,更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因为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作为分配尺度,并以同一尺度应用在情况不同的各个劳动者身上,这就必然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

“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①在这个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着统治地位。

我国现在实行的八级工资制也不平等，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具体表现。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和被剥削、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体现的是劳动力的价格，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行径。而我们社会主义的工资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而是国家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进行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反映的是劳动者个人和代表整个劳动人民利益的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工资制度较之旧中国的那种混乱的、腐败的、极不合理的工资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相适应的一面。但是，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还保留着旧制度的痕迹。我国的八级工资制是一九五〇年制定的。它是通过工资等级表、工资等级标准和技术等级标准三个要素来划分工资等级的制度。工资等级表把工作分成等级，做什么工种按什么工种的工资等级评级，也就是从制度上允许某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拿得多，而另一部分人的工资始终保留在低于这部分人的水平上，客观上会造成不同技术工种之间、技术工与普通工之间、生产工人与辅助工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平等，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调配。从工资标准看，八级工资制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社会劳动力。在某些部门工作工资标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1页。

准高，这就默认了在某些部门、企业工作可以享有较高报酬的特权，从而可能产生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又一种不平等。就技术等级标准而言，也存在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是要自己花本钱的，技术是属于私有的，反映在工资上就是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费用基本上是由社会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①而区分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技术等级标准，让技术高的熟练劳动者领取较高报酬。这就等于让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额外要求的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这就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一种不平等。

可见，八级工资制虽然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可以利用它，并且防止、限制它的消极作用，但是，它是一种有重大缺陷的工资制度。如果，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那末，八级工资制所保留的等级差别会使少数人技术挂帅，钞票打头，围着钱转，这就又回到了“做事就是为了拿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旧道德上去。它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格格不入的。因此，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不甚合理的工资制度，我们应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地加以改革。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革命导师多次指出是一种“弊病”、“缺点”，是“资产阶级的框框”，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这一点，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1页。

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勉强做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更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决不能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平等的王国，把它凝固化，把资产阶级法权永久保留下去，甚至加以扩大。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某些方面事实上不平等的制度，更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对它加以限制，并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它，直至最后消灭它，“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①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7页。

(三) 社会主义社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任务。所谓限制,就是要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和作用逐步加以缩小,并从思想上、物质上积极创造条件,以达到将来最后取消它,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是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你不限制它,它就要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总结国际、国内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经验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的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 限制与反限制的经验教训

让我们先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的故事谈起。

一八七一年五月的巴黎,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天,凡尔赛的反动匪帮派出间谍分子带着阴险的收买巴黎公社将领的罪恶计划来到巴黎。这个间谍对一位高级将领的助手说:“他肯把所掌管的巴黎各城门献出去,凡尔赛可

以给一百万法郎。”

这位将领得知后，气愤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贪图名位的人，我就会替凡尔赛服务，而不会为公社服务了！”他，就是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东布罗夫斯基。

东布罗夫斯基是侨居巴黎的波兰人，曾积极参加巴黎工人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成了杰出的公社军事活动家。他先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后来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能上能下，那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在那里出现。这位公社的将领，穿着普通的军服，完全与公社的战士摸爬滚打在一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为公社捐躯后，他的妻子也只领取五十法郎的抚恤金。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社会公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巴黎公社英雄们的崇高品德，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冲击。

资产阶级法权承认有钱有势就有特权。巴黎的无产阶级却强调竭尽全力去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公社选出的八十六名委员中，除去少数混了进来没呆几天就溜走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外，实际参加工作的委员有六十四名，其中工人代表二十七人，职员八人，新闻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二十九人。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公社委员“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①公社规定，公社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定期改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马克思高度赞扬说，这样就“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是“以随时可

①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①

为了废除资产阶级官吏的特权，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对于工资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四月一日的法令里公社宣布：“考虑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据谋职者后台势力来分配。考虑到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酬”，特“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六千法郎的薪金与当时熟练工人的工资大体相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

公社在经济上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措施。公社发布了关于处理逃亡业主企业的法令，把资本家遗弃的工厂，移交工人来管理。禁止厂主克扣工人工资和罚款，违者依法惩处。公社还下令把劳苦人民抵押在当铺里的二十法郎以下的物品无条件的归还原主；颁布关于延期交付和免除一部分房租，延期三年偿还债务，不付利息的法令；没收逃亡资本家和官吏的房屋，并分给群众居住等。这些改革，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公社在打破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上做得还不坚决，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这是一个极深刻的历史教训。

巴黎公社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巴黎公社革命四十六年以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继

^①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14页。

承和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领导俄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对苏维埃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和实践，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课题。当时，除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叛乱之外，还有一个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反复地论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和交换、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肥沃土壤。为了铲除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老根，列宁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着手变革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取消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划破彼得堡的长空，武装工人占领冬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实行这种变革开辟了道路。为了把马克思“剥夺剥夺者”这个著名的公式，转变为土地、银行、工厂国有化的现实，列宁在领导武装起义的紧张时刻，就起草了著名的土地法令。后来，列宁又亲自写了工人监督条例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签署了关于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的法令，等等，发动了一场“赤卫队攻击资本”的斗争。当时，俄国的银行资本家实行怠工，妄图从经济上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吸取了巴黎公

社在对待法兰西银行方面的教训，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列宁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遵照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指令行动的“拉脱维亚团”的战士，从早上七点出发，到上午十一点以前，就夺取了金融资本家的顽固堡垒，办好了彼得堡全部二十八家银行的国有化的手续。到一九二〇年底，实行国有化的企业已达四千五百家左右。当然，银行、铁路、商船、对外贸易、工厂等收归国有，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在国营企业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还有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在那些领导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的企业中，工作搞得很糟糕。“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散漫、涣散、肮脏、胡闹、懒情的典型”。^②列宁批评苏维埃的报刊没有有力地揭发这些事实上存在的“黑榜”，强调“我们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不作声地容忍这样的工厂，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废物。”^③列宁非常痛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为一小撮人谋私利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号召大家来揭发和批判这种典型，与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在土地国有化之后，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一律无报酬地交归农民使用，农民一共领得了一亿五千多万俄亩的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租金。但是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既是劳动者，又

①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29页。

②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01页。

③ 同上。

是私有者。仅有土地国有化，在一个小农经济象汪洋大海般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列宁非常重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当时，实践已经创造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列宁把国营农场看成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地，在莫斯科附近的马尔采沃——布罗多沃村的“林中旷地”国营畜牧场，就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建立的。列宁努力扶植农业公社的发展，他说：“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①在列宁患病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还写成了《论合作制》这一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虽然没有看到农业集体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完成，但已为这一胜利进军规划好了前进道路：党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必须牢牢地依靠贫农，善于团结中农；合作化之后，还要继续努力去实现由小集体向大集体的过渡，再实现由大集体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实现全民所有制之前，农民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性，如果不注意这点，不继续实行积极的引导，“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②列宁指出了农民的小集体经济，不继续前进，就要倒退，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坚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要货币还存在，价值规律还

①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803 页。

② 《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522 页。

起作用，就必然还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非常注意限制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督，逐步地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商品流通来代替自由贸易，在这方面充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问题，“**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①列宁认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让自由贸易泛滥成灾，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②

为了限制自由贸易，打击投机倒把，国家需要控制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产品，“**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③这方面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以粮食为例，根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的二十六个省的资料，一九一八年在供应居民的一亿二千一百万普特粮食中，由投机商贩供应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三，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规定的价格**”，^④甚至更多。一九一八年九月，投机商从产粮省份收购并运出了四百五十万普特以上的粮食，大量在市场上销售。一九二〇年四月，莫斯科市国家规定的粮价为每普特九卢布七十七戈比，而自由市场的价格则为七百二十四卢布六十二戈比，黑市价格超过了国家价格七十三倍。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不仅自己亲自出马“**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

①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6页。

② 同上。

③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93页。

④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8页。

赚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①而且挑唆贫农去干这种投机活动。譬如，给某个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不要他付六个卢布，而只要他付三个卢布，让这个被腐蚀的贫农也去“享受”投机利益，也去以一百五十个卢布卖出这一普特粮食“发发小财”，以煽动他们来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政权。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党派，代表富农利益，东奔西窜，大喊大叫，反对粮食垄断，“抗议”粮食专卖，提议抬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自由贸易。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列宁号召：“应当起来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者，反对富农、土豪、破坏分子和贪污分子”，“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与燃料的事情上一切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②当时，取缔和依法惩办粮食投机者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粮食投机者分别处以十年徒刑以上的重刑。根据列宁的建议，数以万计的工人组成征粮队下乡，把贫农组织起来，击破囤积、贩卖粮食的富农和投机商人的反抗，夺取他们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和饥饿的工人。苏维埃政权还直接发布法令，取缔自由市场。当时，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自由市场，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一个中心，“苏哈列夫卡”成了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根据列宁反对投机活动指示的精神，莫斯科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二〇年下令封闭了这个自由市场。列宁热情地歌颂这一革命行动，并对这方面的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只要商品生产还在进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① 《论饥荒》，《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60页。

② 同上书，第564页。

——货币必然会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比较快的对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剥夺，但是商品货币制度却要保留下来。要消灭货币，取消商品生产，这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才能办到的。当货币交换还存在的时候，每个手中掌握大量货币的人，都有运用这个“昨天的剥削的残余”，^①来进行新的实际剥削的可能性。“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②列宁认为，“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③无产阶级必须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限制货币交换的范围，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减少货币流通，以便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考察那些办法对于限制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最有效的。为了阐明无产阶级利用货币是为了消灭货币的思想，列宁特别写了《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篇论文，指出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以后，“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目前我们还要爱惜金子，使用货币，不过是“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而已。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应有的那样”。^④

列宁限制交换领域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波浪起伏地前进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国内

①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38页。

②③《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50页。

④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8—579页。

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加上一九二〇年的歉收，困难更加严重。斗争形势要求党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生产力，活跃全国经济。一九二一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变余粮收集制，实行以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贸易自由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活跃起来，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是被迫采取的暂时退却，是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新的迂回方法”。实行这种退却，是“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①列宁满怀信心地预言：“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到一九二二年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就明确宣布：“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③可见，列宁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科学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占统治地位。实行“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由于人们的劳动能力有大小，负担有轻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人们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明确指出，工资制度上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标志之一，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

①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2页。

②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401页。

③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246页。

公职人员”。^①十月革命一胜利，苏维埃政府立即颁布法令，按照公社的原则，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的工资水平。后来，由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需要，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春，提出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政策。但是列宁强调指出，这是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贡款”，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这土壤上绝对不能再生长出任何资产阶级”。^②列宁说，这个办法显然是一种妥协，是一个临时措施；而且，这种“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必然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布哈林之流认为给专家高薪“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列宁斩钉截铁地指出：这“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③

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工资制度差别是比较小的。一九一九年，劳动人民委员向列宁汇报说：我们在平衡工资方面所作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做过而且今后几十年中也不能做到的。的确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粗工每天的工资一卢布，每月二十五卢布，而专家每月工资是五百卢布，比工人多二十倍。而一九一九年时，苏俄的工资幅度是：从大约每月六百卢布到三千卢布，相差只有五倍。列宁说：“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拉平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④一九二一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13页。

②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1页。

③ 同上书，第502—503页。

④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17页。

会强调要缩小各等级之间的工资差额，尽可能比较平均地分配消费品。一九二二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指出，要坚决结束各部分共产党员在工资方面的巨大差别，同利用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培植资产阶级习气的现象进行斗争，制止共产党员领导者个人发财的企图。一九二三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今后总的工资政策应当是，或多或少地拉平一切工业部门的工资和缩小党内物质不平衡现象，并指出这种物质不平衡现象包含着特别严重的危险性，一分钟也不能忽视党的个别细胞有发生蜕化的危险。

列宁经常告诫全体党员，不能够也不应该为自己要求特权，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力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及额外的报酬。对于这些，列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日夜为革命操劳，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吃的是和普通工人一样的黑面包干。他的薪金也同技术工人相仿。一次，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出于对领袖的爱戴，为了列宁的身体健康，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列宁知道后立即严厉地指出，这是公然违法的行为，直接破坏了人民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令，并宣布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列宁在分配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和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要达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①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必须积极扶植新生事物

①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76页。

的幼芽，注意工农群众斗争中的伟大创举。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为了支援反对白匪武装叛乱的国内战争，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无报酬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直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列宁抓住了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幼芽，认为“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①“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②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列宁和工人、职员、军事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的义务劳动。列宁还对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给予巨大关怀，指出“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③共产主义的幼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面。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它会茁壮地成长起来，战胜资产阶级法权，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列宁坚决反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享有任何特权，痛斥那些想“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④的人是资产阶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页。

②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43页。

③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页。

④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94页。

级的奴仆，要求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打击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行为。一九二一年有个红军战士来莫斯科向列宁报告：顿河省有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盗公肥私。列宁立即把反映情况的信件抄本转交中央书记，提议中央指定几个同志组成特别委员会派到顿河省去，把那些证实犯了违法乱纪罪行者就地严肃处理。列宁自己总是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二〇年，列宁需要借阅几本哲学方面的图书参考，还特别向鲁缅采夫博物院图书馆写条子说明：如果按规则，参考书不准带回家，那末在晚上，在夜里，当图书馆下班的时候，可否借出，明早送还。在国内战争的困难年代里，农民、红军士兵和省里的同志们关心列宁的健康，给他送来一些食品——白面粉、鸡蛋、水果。列宁把所有这些食品都转送给医院、幼儿园、军医院以及需要这些食品的同志。莫斯科城郊国营农场的一位场长，在列宁被刺卧病的日子里，想赠送他一筐水果。列宁把这个场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命令将水果立刻送给儿童疗养院。列宁这些崇高的举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有力批判。

可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顽固堡垒不是一下子能够攻破的，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然有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在苏联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新老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利用干部和群众中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列宁逝世以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激烈

的斗争，揭露和战胜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一批一批地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李可夫之流。斯大林当时同他们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阶级敌人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保卫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是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始终存在。在城市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冒头，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出现。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了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通过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尚存在的那部

分资产阶级法权，来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苏修叛徒集团的上台有着深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这样干的。这个叛徒集团既代表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更代表了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要求。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革命的人民还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斯大林一逝世，新资产阶级的势力恶性膨胀起来，早就隐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篡权上台了。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得已经被取消了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又全面地恢复起来。不仅老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活动，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明显出现。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合法的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物质刺激”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泛滥成灾。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疯狂一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的一切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完全解体。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

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普遍重新发生。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完全变成了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就这样，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且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时，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他们是一伙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让我们通过一些点滴的材料来看一看今日苏联那幅复辟资本主义的情景：

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

巴库的格奥克柴果汁厂的经理伙同会计和生产主任等，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砂糖加柠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内牟取暴利近一百万卢布。

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

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他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损公肥己,“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个人的需要。”“他家里拥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

我们仅仅从这些材料,也可见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条例”,什么《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什么《企业内部劳动纪律示范条例》,什么《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等,来巩固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这些法令明文规定,“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国家委派领导人(苏维埃的新生资本家)独揽企业的党、政、财权: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自行确定企业的“编制”,“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凡是“撤消机构,裁减人员”,或职工“技术不够”,“健康情况不适宜”,“生病四个月以上”等等都可以成为经理取消合同和解雇工人的理由。经理甚至有权扣留工人,直至送交司法机关惩处。苏修的一位经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集体农庄主席则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出售农业机器和生产资料,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俨然是个土皇帝。

特权阶层独揽大权,劳动人民一无所有,这就是苏联今日

的现实。在苏修叛徒集团全面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全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之后，苏联劳动人民又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凡是想反驳他或者是表示自己看法的人“都被解雇”，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三百十八人离职，而编制是三百五十人”。塔吉克共和国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强迫童工加丽雅上夜班，被她拒绝，这可触犯了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怒之下，就剥夺了加丽雅的公民证，赶出厂门。结果她在外漂泊两个多月，找不到工作被迫自杀。农庄主席则对集体农庄庄员起“一根鞭子的作用”，他们“催促、驱赶”庄员加紧劳动，“谁也不拿庄员当一回事”。哈萨克“卡拉套”农场有个牧工乌玛洛娃，长年住在一个小毡房里，冬季不能烧火，夏季睡觉连腿都伸不开，他们夫妻俩日夜不离开羊群，可是三年来他们连一顶蒙古包都没有得到。

在如此尖锐的阶级对立中，苏修叛徒集团当然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他们一上台就加紧镇压苏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增加警察，增设集中营、“疯人院”、监狱，炮制一系列的“法令”，强化法西斯专政机器，采取种种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措施，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苏修叛徒集团大肆散布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造反革命舆论，用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时行乐、争夺个人幸福作诱饵，来腐蚀年轻的一代。黄色小说、靡靡之音、裸体画片，比比皆是。据统计，单是一九六五年苏联上映的一百五十部影片中，外国影片就有一百部以上，其中又以西方资本主义的货色占大多数。

由于苏联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因此

“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实际上苏联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一样，是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苏联工业部门的赢利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纪初沙俄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一倍。在贯彻所谓“物质利益原则”口号下，新资产阶级特权集团巧立名目，为自己规定了比工人高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工资。经理、厂长的工资一般为一千卢布左右，而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集体农庄普通庄员的平均工资在二十至三十卢布之间，而农庄主席的月薪一般为三、四百卢布，有的高达一千卢布以上。在党、政、军系统的高薪就更多。至于高奖金、高稿酬、高津贴更是为一小撮特权阶级所垄断。据一九七〇年颁布的关于国营农场领导人和专家劳动报酬标准条例的规定，农场主席等的奖金可达到其每月固定工资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实际上有的领导人获得的奖金高达基本工资的一至二倍以上。哈萨克某农场主席和农艺师所得的奖金，竟等于他们工资的五倍。在科学文化界，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每月增加五十卢布的学位津贴，博士增加一百卢布，当选通讯院士与院士者增加三百至五百卢布。电影界每拍一部影片，导演、摄影师与演员最多可得达八千卢布的高额奖金。科学文化作品都是商品，高价出售，获得高额稿酬。至于苏修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那更是“天之骄子”，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钞票可以取之不尽，过着华尔街百万富翁一样的腐朽生活。他们热衷于修建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一些私邸和私人别墅里有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还有的甚至筑有精致的雕塑和大理石楼梯。他们在专设的特殊商店里每月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就可以吃“俄国

传统的美味食品”，也可以购买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

列宁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它说明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什么可限制可不限的问题，而是必须限制的问题。不限制它，就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千万不可等闲视之。目前，那些“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苏维埃资本家”虽然完全控制着苏联国家和企业的统治权，象豺狼一样地吞噬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以肥自己，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只不过是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支短暂的插曲。苏修叛徒集团从他们的复辟第一天起，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掘墓人。他们对苏联人民越是压迫、剥削得厉害，就离走入坟墓越近。不管他们如何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人民革命是永远镇压不了的。我们寄希望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坚信列宁主义的旗帜终究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高高飘扬。

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建国后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

俄国十月革命三十二年后，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同刘少奇、

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激烈的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我国，对资本主义“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① 在旧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官僚资本主义占全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全国一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就没收了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商店以及其它企业事业共二千八百五十八家。这是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措施，也是取消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伟大胜利。紧接着，党和国家又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实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方面，打了一个大胜仗。

然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② 限制和反限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就竭力反对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拼命保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巩固资产阶级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1页。

^② 同上书，第1322页。

法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刘少奇，对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感到极端恐惧和仇视，先后窜到天津、华东等地，对资本家狂热地宣扬“剥削有功论”，胡说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随后，他又在北京继续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公然叫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长期合作”，“有钱大家赚”。刘少奇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一纲领性的反动口号，来对抗党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路线和政策。这个反动口号，实质上是要“巩固”资本主义，即在政治上“巩固”资产阶级地位，在经济上“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一句话，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解放了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毛主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①同时，毛主席又及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① 转引自《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①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对刘少奇一伙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主席又领导全国人民对个体农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是限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又一重要步骤。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个体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②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按照毛主席规划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互助组，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可是，刘少奇又跳出来疯狂反对毛主席对个体农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反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互助合作运动，胡诌将来合作社“势必要缩小”，竭力主张发展“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还叫嚣“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而林彪也积极配合，鼓吹要“确保私有财产”，在他领导的那个地区贴出了“四大自由”的布告。刘少奇、林彪要“确保私有财产”，发展“四大自由”，就是要“确保”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使资本主

① 转引自《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2页。

义自由泛滥。一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广大贫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是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挑战，是一个进一步限制生产资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革命行动。可是刘少奇却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背着毛主席，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横加指责，诬蔑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看！刘少奇这个扼杀农业合作社的刽子手，是多么仇恨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啊！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刘少奇的这个“批语”以后，立即以极大的愤慨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①毛主席的指示，再次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面对这大好形势，刘少奇吓慌了手脚，他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妖风，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一些刚办起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这样被扼杀了。一九五五年，刘少奇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再次策划“反冒进”的活动。同年五月，刘少奇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批准了大砍合作社的计划。仅在

^① 转引自《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两个月内,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被砍掉了。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面临被刘少奇扼杀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接着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①同时,毛主席又痛斥了刘少奇等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严肃地指出:他们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②

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过,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当时,大叛徒刘少奇和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炮制了所谓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妄图使大家埋头生产,以便他们搞私有制复辟,使资产阶级法权在已经取消的范围内卷土重来。林彪则叫嚷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全盘恢复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经过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始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

①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单行本第24--25页。

其它不适应的部分进行有力的冲击，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毛主席高度赞扬了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集中了群众的革命要求，于一九五八年明确地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当时在报刊上展开的那场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论战，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一伙人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采用肆意歪曲，倒打一耙，强加于人等恶劣手法，进行抵制和破坏。然而，革命潮流岂能阻挡？蓬勃发展的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把那些修正主义者远远抛在了自己的后头。

当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行动冲破了“资产阶级框框”之后，刘少奇一伙则又改变手法，以“左”的面目出现，鼓吹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取消价值规律”，并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应当“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他们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妄图扼杀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对此，毛主席给以严厉批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中指出：“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

刘少奇一伙眼见自己的复辟阴谋又破产了，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一九六二年，他们抛出了“三自一包”、“利润挂帅”的黑货，叫嚷“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

去”，还派出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经验。林彪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狂叫要保护私有制，胡说什么“大集体不高兴，小集体鼓干劲，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可见，刘少奇、林彪都顽固地要求复辟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要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统统来一个大倒退，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去。他们以“黑户”为自己理想的最高一级，这个绝妙的自供，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心声。什么“黑户”？就是非法牟取暴利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他们要开历史的倒车，是违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贫下中农说得好：“单干户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刘少奇、林彪一类多次向党的正确路线发动进攻，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不断进行反击，经过反复较量，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然而，刘少奇垮台以后，林彪又公开跳了出来，疯狂地反对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采取的各项革命措施，对大批冲击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恶毒攻击。

对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涌现的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新生事物，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促使它们发展壮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和大力扶植了许多代表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新生事物。如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引革命

干部走五·七道路；毛主席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主席亲自肯定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有力的限制。

林彪反党集团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都是腐朽没落的旧事物的卫道士。他们千方百计地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冲击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的幼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是一个拚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攻击新生事物的反革命宣言书；是疯狂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动员令。在这个《纪要》中，广大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被诬蔑为“变相失业”。各级领导机关精简机构，干部深入群众，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被攻击为“打击干部”。大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被诬蔑为“变相劳改”。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又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反党集团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等等。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这个反革命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和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

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们妄图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青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如此等等。这个反革命计划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它特别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限制。然而，林彪反党集团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端孤立的。他们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诱惑人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最终只落得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现在，林彪反党集团虽然早已垮台，但是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仍在继续。走资派还在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十分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拚命反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刮起右倾翻案风，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建国以来围绕着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告诉我们，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惯用手法。马克思主义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修正主义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百多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武装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还要长期地艰苦地进行清扫旧基地的工作，对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直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工人同志说得好：“资产阶级法权不限制，社会主义要倒退，资本主义要复辟，劳动人民要受二茬罪。”

怎样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呢？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党的基本路线，是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制定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总政策；它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目标。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生命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清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正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内容。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总是要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妄图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谈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手里,才能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坚持下去。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既是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又是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在总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国的阶级斗争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四个一切无疑包括了我们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全部工作。只有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最后也解放自己。如果在理论上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不可能坚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一切方面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会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去扩大它,让它自由泛滥,这与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如此下去,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

· ①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

等牛鬼蛇神就会一齐跑了出来，进行反扑，一批一批地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篡权上台，“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可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内容，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

党的基本路线是管总的。它反映了各条战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的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共同的原理、步骤和方法。党的现行政策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当前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特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执行党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我们有些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既承认它，又适当地加以限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比如，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我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由于社会产品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多数人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未极大提高，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既要承认劳动收入的差别，更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逐步缩小个人间收入的差别，防止新的两极分化。可见执行政策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忘记党的奋斗目标，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对资产阶级法权只看政策允许存在的一面，不看必须加以限制的一面，甚

^① 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至加以扩大,就要犯右的错误。当然,也不能反过来,只看必须限制的一面,不看允许存在的一面,想一下子把资产阶级法权统统取消,那也是不对的。两者都不利于正确地落实党的政策,都不能够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第二,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就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由于我国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例如,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必须坚持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要不断壮大社队经济,逐步缩小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努力创造条件,向大队、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过渡;要逐步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对某些个体所有制残余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如果我们不坚持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那么在所有制的各个环节上,都还有可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大寨大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他们始终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真正做到批资本主义寸土不让,干社会主义分秒必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制变更之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所有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搞得不好,会导致所有制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我们要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度,不断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完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促进派。现在,广大工人群众正在

进行努力,不断完善企业内外相互关系。工人说得好:“若要关系改得好,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掉。”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分工过细以及由旧的分工所产生的等级制度,阻碍着人们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拿我们厂的电炉炼钢来说,就有一炼钢手到六炼钢手的区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规定:“三级工才能上炉前,六级工才能当组长”,“下手”只能听“上手”的话,论资排辈,等级界限很明显。文化大革命中冲破了这些清规戒律,但旧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有的干部把分配“上手”去干“下手”的活当作“惩罚”。有的工人干完了“本职”工作,即使没事干,也不愿帮“下手”干活,觉得不光彩。在这次学习理论的运动中,工人们豪迈地提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想全局,急全局,千方百计为全局”的口号,自觉地做到:提倡争上游,反对“别苗头”;提倡挑重担,反对踢皮球;提倡互相支持,反对互不服气。他们说:“不管你家我家,都是社会主义一家”,“不管前道后道,都是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我们厂里人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这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象钢花一样放射着夺目的光彩,有力地推动了钢铁生产。如有一条红钢生产线,是将二车间的钢坯由运输部门运送到七车间开坯。过去,由于相互扯皮,热钢经常变成冷钢。通过学习理论,大家从全局出发,努力改善相互关系,发扬“龙江”风格,热送钢锭的装炉温度普遍提高了一百度,不花任何代价,每年可增产钢坯一万多吨,节约用煤五千吨。大家高兴地说: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管好了“红钢线”。这个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人们的相互关系调整好了,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并不局限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是涉及到各个企业、

各个经济部门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表现为它们在生产协作、产品交换、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的交流等多方面的活动。这种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有领导的、有计划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相互交换的活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

第三，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

“物质刺激”是以“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具体化，实际上是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力当作商品，用“钱”来“刺激”工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来扩大工人、农民内部的等级差别，把他们引上只追求眼前利益，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的邪路上去。这只能腐蚀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灵魂，瓦解工农劳动群众的革命斗志。“物质刺激”所刺激起来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而是那种唯利是图、发财致富的积极性，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严重地阻碍着“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幼芽的成长，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现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工人们说：“‘物质刺激’就是要把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的产业工人，变成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妄图使工人得了奖，忘了党；拿了钱，丢了权。”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提高大家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决同“物质刺激”这种修正主义的东西开展斗争。

在工业管理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企业在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大搞物质刺激，在方向、路线上产生了很多错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但是，有些同志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时，已批判过的东西又会冒出来。如我们厂的转炉车间，前几年钢产量都比上海其他钢厂的同类型车间要低一些。车间领导看到钢一时上不去，急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用什么办法把钢搞上去呢？由于无产阶级政治没有在头脑里深深扎根，一度认为政治思想工作“远水不救近火”，还是搞点什么东西“刺激”一下来得快。于是他们一会想搞“奖”，一会又想搞“罚”，后来又想了个“敲”的办法。比如，炼钢炼到多少吨、炉子砌到多少只、浇钢平板砌到多少块，凡是达到指标后，就敲锣打鼓送喜报，总共规定了十三条，想用这个办法把群众的积极性“敲”起来。结果锣鼓敲坏了，反而助长了本位主义，交班时出现了钢水出光、包子用光、平板浇光的现象，交接三班之间关系搞得很紧张。看上去，锣鼓敲得热热闹闹，但不是大长了无产阶级正气，而是助长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锣鼓没有敲到“点子”上。工人批评说：“敲锣打鼓十三条，条条单讲产量高，路线风格都不要，要把我们引向哪里跑？”在批林批孔中，这个车间的干部联系实际，发动群众，集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纠正了原先的就钢抓钢的错误倾向，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狠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车间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抓住了首位，促进了吨位，全车间钢的年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试验成功了纯氧侧吹炼钢新工艺，为我国多快好省地改造侧吹转炉提供了经验。同志们深有体会地说：“物质刺激不臭，政治挂帅

不立,思想路线要偏,企业性质要变。”

第四,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大力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新生事物的成长,意味着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对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革命导师总是热情地歌颂新生事物,为它的成长大喊大叫。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①列宁严肃地批判那种讥笑新生事物幼芽嫩弱的态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②伟大领袖毛主席热情地关怀新生事物的成长,亲切地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③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面。每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一次打扫,对资产阶级法权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和限制。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普及,工农兵理论队伍的成长壮大,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广大干部参加“五·七”干校和集体生产劳动,等等。所有这些新生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资

①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08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5页。

③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

产阶级法权。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不脱产的工人群众理论队伍，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战斗，有力地粉碎了“大老粗搞不了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在上层建筑的一些方面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局面。象我们厂，现在共有一百多个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参加人数达一千八百多人，最近两年就写了三百多万字的文章和书籍，这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于及时地批判在群众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促进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对于用新鲜血液去充实和改造原有的理论队伍，有着重大的意义。又如，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几年来，把自己中学毕业的三千多名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些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其中已有一百五十多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千一百多人加入了共青团，二百八十多人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他们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的各种工作岗位上。这对于普及大寨县，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伟大的意义。总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代表着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方向，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幼芽。它的成长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所以我们要坚决地站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一边，反对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努力清除旧社会的痕迹，做一个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促进派。

(四) 彻底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思想

我们厂的工人在学习中豪迈地说：“工人阶级大无畏，基本路线记心怀，彻底破除旧观念，精神枷锁齐砸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一条精神锁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共产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彻底决裂”当然包括了要砸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条精神锁链。事实一再证明，在人们的头脑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多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少了，马克思主义就少了，当修正主义思潮袭来的时候，就会辨不清方向，甚至跟着跑。因此，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绝对不能习以为常，泰然处之，和平共处；而应该憎恶它，批判它，破除它。

认真看书学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共产主义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它是一种思想腐蚀剂。你不破除它，它就腐蚀你，使你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而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

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①民主革命阶段尚且需要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更加显得迫切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现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共产主义精神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蓬勃发展。腐朽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已经或者正在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被人唾弃。破等级观念，立同志式的关系；破雇佣思想，立主人翁精神；破到顶思想，立继续革命斗志；破本位主义，立龙江风格；……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思想风尚闪闪发光。当然，“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②这是因为反映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改变。相反，它还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发挥其影响。在我国，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还在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批判与资产阶级反批判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一场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深刻、更广泛的斗争。

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有武器。俗语说“打狼要棒，杀敌要枪”。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要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关键。毛主席在领导我们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总是反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6页。

② 毛主席：《介绍一个合作社》。

通马克思主义,在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又再一次明确地指出:“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①

认真看书学习,要学好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理论是路线的基础。理论搞清楚了,行动才有方向,才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够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破除什么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斗来斗去,归根到底是在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问题上。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②林彪一伙反革命分子,正是这样干的,他们往往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列主义。有时候他们“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欺骗那些不读书,不学理论的人。我们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就可能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去推广,把修正主义的口号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去传播。只有坚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够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真正做到“大风大浪不迷航,花言巧语不上当”,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斗争中,乘胜前进。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诸如特权思想、地位观念、鄙视劳动、瞧不起工农、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等思想,都属等级观念之列。等级观念的基础是一个“我”字,即资产阶级私有观念。同志们一定很熟悉革命现代京剧

^①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39 页。

《红灯记》中《赴宴斗鸠山》这场感人肺腑的戏。日寇宪兵队长鸠山，妄图动摇李玉和的革命意志，使出了浑身解数，抛出“为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做人的诀窍”，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动攻心战。这一套腐朽的破烂货色，对于共产党员李玉和说来，“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确实是资产阶级做人的“最高信仰”。在资本家的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是天经地义的。

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是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人剥削人的关系，“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① 资产阶级“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② 在那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总是和资本的有无、多寡联系在一起的。有钱的人是高贵者，可以享受种种特权，可以欺压人、剥削人。穷苦人是卑贱者，受尽欺凌和剥削。所以，资产阶级总是拚命地捞取财富，把能不能赚钱作为观察事物、估量得失、权衡利弊的唯一标准。在资产阶级看来，“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③ 他们以追求更多的金钱，爬上更高的位置，享受更多的特权，作为人生的目的。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里，推翻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以金钱多少作为等级阶梯的现象已成非法。但是，旧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立即消灭。等级观念还在侵蚀着人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47页。

③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64页。

们的头脑。林彪一伙鼓吹“一本万利”，妄图以“钱能通神”、“有钱可使鬼推磨”一类黑货毒化劳动人民，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大叫“人和人的关系——专门利己”，散布“解脱体（力）劳（动）”“才能想问题”、“父在前子不言，师在前徒不言”、“娶来的妻，买来的马”、“人人相待，有如豺狼”、“有奶就是娘”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孔孟之道，妄图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以及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统统变成等级压迫关系。他们以“官、禄、德”来引“诱”干部，要人们拚命去追求高官厚禄，把“升官”作为“发财”之道，妄图无止境地扩大等级差别，从中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发展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也有些同志被资产阶级等级观念这条无形的精神锁链禁锢着头脑。有的人把资历、知识和技术当作资本，向党闹地位，争待遇，要名誉；有的人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能工不能农，只愿在城市，不愿到农村；有的人尽量想摆脱体力劳动，追求一官半职，这些都是头脑中等级观念作怪的缘故。总之，在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等级思想还在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一部分人去追求成为居于群众之上的享有特权的人物。恩格斯曾经指出：“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①革命导师早已向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

^① 《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8页。

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破除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这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资产阶级等级观念是一道无形的墙，它离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损害革命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立新功，就要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种革命精神。

大家都很熟悉井冈山斗争的英雄业绩。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斗争惊心动魄，而当时的物质生活却异常艰苦，“**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①红军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又那样频繁，为何丝毫没有影响他们高昂的革命斗志呢？毛主席对此曾作过深刻的总结：“**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②红军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伙，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③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崭新的关系。它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

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革命无限忠诚，为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人民鞠躬尽瘁，处处想的是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革命队伍内部建立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平等的同志式的相互关系。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不是靠手里有枪、有权，耍官架子、摆威风来处理问题，更不是按金钱多少来区分等级，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真理、靠说服教育来处理相互关系。正是这种新型的关系，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打败了一切凶恶的敌人，夺取了全国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国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大多数干部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们当“官”不象官，成年累月地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做到了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王进喜、焦裕禄、王国福式的好同志。他们想党所想，急党所急，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必然要用离间干群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进行捣乱和破坏。林彪竭力鼓吹的“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的反革命谬论，就是妄图使我们的干部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他们还以资产阶级的名利地位为诱饵，利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等手段妄图引诱、腐蚀干部，把他们拖下水。对于阶级敌人这方面的阴谋，我们应该抱有百倍的警惕。我们有的干部官架子十足，不平等待人，瞧不起群众，他们总是认为“你是我管的”，就要“我说你听，我令你行”。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干群

团结，损害了革命队伍内部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这种人根本没有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划清界限，我们必须对他大喝一声，同志，赶快悬崖勒马，修正主义正在那里向你招手哩！

我们干部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①人民给我们以职权，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委托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我们有了某种职权时，就要想一想，用这个职权去干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还是谋个人私利？有许多干部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职权，不是特权”，“要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在为人民服务上。”说得多么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要使我们的言论、行动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干部在处理一切工作时就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辈子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反对任何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只有这样，才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算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勤务员。相反，如果把职权当成特权，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想为个人捞到点好处，或者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搞方便；对自己掌管的部门或工作，搞“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假公济私，拿人民的利益作交易换取私利等等，这都是资产阶级特权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根本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如果在革命队伍中滋长、蔓延，就会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大庆和大寨的干部，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大庆广大干部，在六十年代石油会战以来，一直坚持了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约法三章”，即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搞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不骄傲自满，不说假话。大寨的干部，为自己订了三条守则，即不自私，不特殊，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那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就没有资格当干部，不能带头干脏活、重活、危险活的，也不能算好干部。这些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化措施，大大促进了大庆和大寨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我们革命干部一定要向他们学习，要象他们那样，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袭，增强抵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侵袭的免疫力，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带头人。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资产阶级的雇佣观念表现在劳动态度上就是“干那一级活，就要拿那一级钱”，“干多少活，就要拿多少钱”，这与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根本对立的。现在，广大工人提出“不在报酬多少上兜圈子，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不做金钱的奴隶，要做国家的主人”。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思想，是对雇佣观点的深刻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等级观念的深刻批判。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

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① 不计报酬,这对于资产阶级以及中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毒素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历代剥削阶级都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林彪的话说“利己多欲乃规律”。在他们看来,谁出了力气,有钞票不拿,或者出力气多,拿钞票少,那就是“傻瓜”。但是,对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来说,不计报酬,却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我们提倡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完全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远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现阶段,虽然还需要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模糊了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目标。所以,在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必须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对立面是雇佣观念。林彪一伙反革命分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总是用一套雇佣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他们竭力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不要怕它会滋长工人的雇佣观念,“为求得更多的报酬而进行更多的生产”,“并没有害处,而且是合理的、进步的”等等。林彪一伙鼓吹雇佣观念,就是妄图使我们把自己摆在雇佣奴隶的地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78页。

位。如果我们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正确对待按劳分配，中了林彪一类骗子的奸计，把自己作为商品向国家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什么国家大事，什么党的基本路线，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统统置之脑后，那末林彪一类反革命阴谋就会得逞，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到破坏。我厂工人同志很生动地说：“钱和线，差半边。只顾钱，不看线，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中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搞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积极性。靠“物质刺激”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会使人们只顾个人利益，忘记工人阶级肩负着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这种个人主义的积极性越高离社会主义就越远，会把工人引到邪路上去。我们要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列宁曾指出过：“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①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批林批孔运动，广大群众愈来愈认清了林彪一类鼓吹雇佣思想的险恶用心，坚持同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作斗争，发扬了共产主义精神，树立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上钢三厂供运车间钢渣出厂组十二位老工人，年老体弱，有的还是医生规定要长期休养的人，但是，他们谁也闲不住，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坚持奋斗。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享受享受”，他们回答是：“干社会主义要比贡献，不能图享受，为共产主义添砖加瓦，就要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他们常年累月外出工作，按国家规定有伙食补贴，但工人们每天带

^①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104页。

着馒头或饭菜，到工作现场热一下吃，十年多来没向国家领取一顿饭菜津贴费。这些行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有力冲击，也是对林彪一伙宣扬的“金钱万能”的有力批判。我们要努力发扬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做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的模范

在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激烈搏斗的今天，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不论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还是作一般工作的同志，也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群众，都要抓紧世界观的改造，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彻底决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它是人们思想的总开关，对于一个问题、一件事情，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不同，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在要不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有的同志能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不断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决裂，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模范。有的人则不能，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那么人们头脑中有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理所当然，没有必要去破除它。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前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后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去的。”^①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

^① 毛主席：《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

在，心不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毒害我们。我们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进攻，永葆革命者的战斗青春。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反革命分子钱守维，为了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打着“替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的幌子，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诱骗装卸队长赵震山上当。他叫嚷“高中生当了个装卸工，是有点大材小用”，鼓吹装卸工“见人都矮三分”的等级观念，妄图煽动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工人韩小强犯错误。而赵震山、韩小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都险些受骗上当。剧中的英雄人物方海珍，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所以能够察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方海珍指出：“装运这批援非稻种，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装卸工这工作意义深长”，“这一包一件，紧连着世界风云”。钱守维制造散包事件后，方海珍以敏锐的阶级警觉和惊人的魄力，发动群众连夜追查，终于弄清情由，及时完成了援外任务。可见，我们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彻底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才不会被商品、货币交换等花花世界弄得昏昏然，迷失方向，以至上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圈套。我们世界观改造得越好，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破除得越彻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就越有力，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敢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不断涌现。老红军

战士甘祖昌，原是新疆部队后勤部部长，党的高级干部。当他由于头部三次重伤，后遗症严重，难以坚持原来的工作的时候，不是考虑去“享福”，谢绝了组织上的种种照顾，于一九五七年重新背起粪筐，拿起锄头，去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带着全家回乡务农的第一天，村子里就议论开了，“甘祖昌是告老回家享清福的吧！”“当了这么大的官，还当农民？”甘祖昌却以实际行动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他与社员群众并肩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犁、耙、插秧、划禾，样样干。数九寒天，他照样脱下鞋袜，走下水田。三伏连秋，在紧张的“双抢”季节里，他总是迎着星星出，披着星星归。甘祖昌不仅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而且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从不搞特殊化。按当地规定，社员家里照明一律装十五支光的灯泡。社员大会决定，祖昌伯年老眼花，晚上学习不方便，给装六十支光的灯泡。甘祖昌不同意。他说：“年纪大，受党的教育时间长，更不能特殊。”最后和大家一样装了十五支光的灯泡。甘祖昌平时关心社员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为自己家里花一分钱，总要掂一掂分量，可是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购买化肥、添置农业机械，解决社员生活困难，十几年来，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一位老人对甘祖昌说：“你年纪大了，可也得为子女积蓄点吧。”甘祖昌笑了笑说：“从前辈那里继承遗产和特权，这是剥削阶级的观念，我们无产阶级留给后代的，只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

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贡献的思想品质,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象甘祖昌同志这样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彻底决裂的模范,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屡见不鲜,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老红军团长方和明,解甲归田,坚持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人老心更红。解放军战士魏尧升,复员不回上海市,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很多知识青年工厂不去,城市不蹲,扎根农村,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自己的一切。还有许多常年管财、管物和管采购工作的同志,坚决抵制请客送礼、走后门等“资产”风,他们“近水楼台勿得月”,“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些同志都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弄清楚问题,从而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侵袭,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模范。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①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坚决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决裂,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工人同志说:“我们要成为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铲土机’,推掉资产阶级土围子的‘推土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播种机’”。这话说得多么有力啊!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①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